

■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

中日韩三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

李琦珂 曹幸穗

【摘要】“风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和韩国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迥异于中国“风水”的日韩风水文化。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蕴含着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三国的“风水”均暗含了现代建筑生态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特点。无论是在“风水说”层面,还是在“风水术”层面,三国“风水”均各具特点,其迥异性具体体现在“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大方面。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三国“风水说”和“风水术”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东北亚汉文化传统的理解。

【关键词】 风水文化 ;“风水说” ;“风水术” ;中日韩三国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 (2013) 01-0108- (11)

【收稿日期】 2012-08-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05ja770013)

【作者简介】 李琦珂 (1973-),男,内蒙古丰镇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曹幸穗 (1952-),男,广西桂平人,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5)

在东北亚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风水”^①对中日韩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乃至日常起居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遗风流俗至今犹存。风水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上,贯穿在农业文明的经脉之中,根深蒂固,久盛不衰。

“风水”,又名堪舆、相地术、阴阳术、青囊术,是关于如何确立民居、村落和坟墓的位置、布局、朝向,以求自己和后代获得好运的理论和方法。“如果对风水不了解,要深入了解中国和东亚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尹弘基在谈到“风水”在东北亚汉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时,曾作过如是评价。

日本和韩国的风水文化,均脱胎于中国的周易思想。早在盛唐时期,高句丽政权和日本政府就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者,学习中原(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其中自然包括大唐(中国)的国

① 中国人使用“风水”一词,是较晚的事。作为没有确切解释的单词,“风水”尽管在汉朝已有,但真正文化意义上的“风水”,出现于 4~5 世纪。成书于 1686 年的《雍州府志》,认为日本在公元 998 年就开始使用“风水”一词。但也有人认为,“风水”一词是从 1354 年开始在日本使用的。韩国的“风水”概念出现于朝鲜(二战后,朝鲜半岛被分为南北两半),大约是在高句丽王朝以前。

粹——“风水”。伴随着天文、历法等知识的东渐,中国“风水”也漂了洋,过了海,在东北亚两个岛国扎了根、落了户^①。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风水思想与日韩两国的地理特点、宗教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不断结合,逐渐沉淀,最终形成了两国各具特色的风水文化。

一、中日韩“风水”比较的文化背景及科学基础

“风水”既是文化,又是科学,既是艺术,又是技术,其间蕴含的文化韵味和科学意识,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风水”理论中,既有“天人合一”观、“阴阳”论、“五行”说等深邃思想,也有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深刻道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和整体性学问。在我看来,之所以能将中日韩三国“风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三者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科学原理。

(一)文化背景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风水文化的精髓和灵魂,除了渗透在社会人群的文化心理之中,还体现在物化出来的人工自然环境之中。倡导“天人合一”的东北亚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讲求“和合”、“仁善”的多元文化。中日韩“风水”是汉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着三国人民渴望亲近自然、和合万物的居心理。

中日韩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风水”是由“易学”中的“三才”理论脱胎而出。《易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从易学的角度看,“风水”是“远取诸象”的学问,是给“天”、“地”“看相”的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渊源深厚。《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亦有人之道,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风水”就是要通过观天察地,对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感应关系进行世俗解读和功利运用。

“风水”尤其讲究“阴阳”,“阴阳”交合,“五行”生克,造化之鬼神,万物之魂魄,生命的秘密,宇宙的奥妙,悉在其中。此后,“阴阳五行”论和“元气”学说渐相融合,形成了“气—阴阳—五行”一体化理论,用以窥探世界的本原、属性以及自然万物生化发展的规律,规约天地间人的生老病死、行居饮食、婚配交媾等世俗行为。

“风水”产生于古代农耕社会,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而不断采取的自我完善手段。传统风水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讲究背山向川,藏风聚气,原因者何?首先,背山如围屏风,温暖舒适,不仅能够阻挡冬天凛冽的北风,而且可以吞吐来自南方的湿润之气。其次,山前必须有干净又丰沛的溪流,山和水之间还须有平整的田畴,这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有利于庄稼的生长……,所有这些“风水”讲究,均源起于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周公为营建洛邑而占卜,形成了“风水”思想的雏形。后人为了附会周公的

^① “风水术”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尽管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但据推测,应该至少在新罗时代(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学术界一般认为“风水术”是在朝鲜的百济、新罗和高句丽时期传到日本的,日本有关“风水术”的最早记载是在公元602年。古时日本的风水先生叫“阴阳师”,从属于阴阳寮。“阴阳寮”是政府管理风水的组织,其职责是“掌占筮,相地”。

宇宙演化、自然变易思想,穿凿而成《易经》,据说这就是“风水说”的萌芽。在科学还未昌明的时代,古老的“风水”思想逐渐融入先民生产、生活经验,不断糅合天文、地理、伦理乃至建筑方面的知识,形成了一套庞杂的理论体系。“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诸多方面。其中,偏重于理论阐述的部分,称之为“风水说”;偏重于实践范式的部分,称之为“风水术”。

(二) 科学基础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风水”思想包含有地球物理学、天文气象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诚如日本著名学者郭中端所说:“风水实际是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规划学和建筑学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1]何晓听先生在《风水探源》一书中也指出:“分析风水,不难发现其中不少对事象因果关系的歪曲认识或处理,也明显带有巫术的气息。但更多的则是科学的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2]

“风水”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建筑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风水”的产生乃至发展,与人类栖居方式的演变与进化,相伴相随,相始相终。人类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寻求一种遮风避雨、防范天敌的寓所,仅仅以自然山洞土穴作庇护,尚不能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人工建造的简陋居所。在缺乏现代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古人往往单纯依靠“风水”来选址择居、荫庇自我。

“风水说”,是人类生态环境学;“风水术”,则是居处环境选择术。人作为一种生物,其与环境(尤指天与地)的关系,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风水”强调把人类置身于由天地、自然构成的宏观大环境中,吸纳天地之精气,吞吐万物之生机,蓄养自身之吉气。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价“风水说”:“建立在道家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建筑和伦理等多方面学识的理论和实践知识。”^[3]风水师往往通过象征、隐喻等方式,师法天地、自然,以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实现精神愉悦和意愿满足。风水是使生者与死者之处所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风水建筑因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有机地结合,收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审美效果。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写道:“就整个而言,本人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布中国农田、屋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皆可借此得以说明。”^[4]

二、中日韩“风水”文化的共性

(一) 功利性

因为中日韩“风水”所要求的房宅设计,事关自身的安危与健康,所以需要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营造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植被茂盛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活方便、精神舒爽的双重目的。如三国“风水”之所以都主张在河边较高的台地上建房造屋,是因为这里既方便汲水,又能免于水患;之所以有“弓”的禁忌,是因为在河曲弓背处居住时极易遭遇水灾,在道路拐弯处行走时最容易被车马冲撞。之所以强调多植树木,多种花草,是要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表土植被,不仅保持水土,调节气候,还可借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颐养身体,陶冶情操。

中日韩三国“风水说”把天、地、人、生四大系统联系起来作整体的关照,综合考虑地理、生

态、景观、建筑、伦理、美学等各种环境和心理因素,为安身立命、自我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三国“风水术”都试图通过气候、土壤、水分、阳光、植被、山形、水势等自然因素的合理配置,营造一个藏风聚气的居处环境,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子孙。这种有意营造的情境,不管是在现世,还是要为来世,都要既照顾到物质方面的享受,又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

(二)生态性

“生态”一词,原创于日本,后被翻译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韩国。所谓“生态性”,就是指生物(人也在其中)同环境的统一性。“风水”之说是古代的生态学,是一门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综合学问。“风水”之术就是通过生态因子的调节,实现“天—地—人”系统生态功能的最大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经度和纬度是基本确定的,地质地貌和光照温度,也都是相对恒定的“常数”。对于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态系统而言,由于“风”和“水”是最不稳定的一对生态因子,因而只有把握住“风水”,才可以把握住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改变了“风水”,就可以最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

“风水说”讲求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及能动性,其间蕴含着现代生态学的原理。“风水术”既要自然环境进行选择,也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选择自然环境,应了解其吉凶利害;改造生存环境,须顺应其客观规律。《相宅经传·阳宅宜忌》云:东种桃柳,西种桤榆,南种梅枣,北种奈杏。^[5]

无独有偶,韩国对住宅外部空间种植的树木树种和位置朝向,也有明确的禁忌和说教:宅中有杏西有柳凶宅,西有桃北有梅淫宅,宅四畔竹木青萍进财,凡树木向宅则吉背宅则凶。^[6]

如果用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做法:“东种桃柳”:桃树、柳树,属于向阳树种,宜种在阳光充足的宅东;“西种桤榆”:桤树,防风、喜光、耐寒,种在宅西,适于抵挡西北寒冷空气的侵袭,榆树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可以净化西北吹来的空气;“南种梅枣”:这两个树种,色香味俱全,既可调适杯羹,又能怡情悦目;“北种奈杏”:这两个树种性寒、耐旱,既可抵挡冬天之风寒,又能调节温度、湿度。

(三)系统性

系统论思想启蒙者普里戈津这样评价“风水”说:“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7]以此来关照,中日韩“风水”中蕴含了朴素而又深刻的系统论思想。三国“风水”均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认为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他们强调本着整体系统的原则来观天察地,在考察形势的时候,又强调将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考察大环境在水源、气候、地质等方面对小环境的影响。在风水建筑设计的时候,不仅注意一房一宅的设计,而且注意整个单元建筑物的布局,尤其关注整个单元与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

与西方文明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同,中日韩“风水”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法则。从这个角度上讲,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恰恰是中日韩风水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中日韩三国“风水”,之所以主张观天察地、取法自然,是因为他们都已注意到了宇宙星体与人类居处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了地球磁场和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注意到了土壤、水流中的物理、化学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且已经能够把天象地脉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人类学家贝尔预言,后现代社会最终会走向“神圣的复归”,这种“神圣的复归”,是人类与自然由分离到

统一的复归,是人与环境由对立到和谐的复归。

三、中日韩“风水说”及“风水术”的差异

“风水”是“风光山水”的简称,其基本内容和规范,体现在“风水说”和“风水术”两个层面。“风水说”即“藏风得水说”,是为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选址的一种思想和学说。“风水术”则是指导人们选择和处理住宅与坟地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择日的方法和手段,是选择居处环境的一种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同源而异流。三国的“风水说”和“风水术”,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迥异,但其揭示的生态内涵和文化意蕴,渊源深厚,异曲同工。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风水说”,尽管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思想,但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遵循不同的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①和实践范式。它们沿着各自的方向并行不悖,其演化轨迹时而重叠,时而分离,最终殊途同归,统一于现代生态学^②和汉文化的范畴之中。

(一) 三国“风水说”之比较

伴随着早期的文化传播,“风水”思想从中国传到了日本。“风水”思想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不断发展成为带有强烈民族气息的日本“风水”文化。日本“风水”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融入了佛教(神教)^③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神秘气息和繁琐仪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风水”理论十分强调尚德原则,认为“风水”能涵养“人”,能孕育“仁”,德厚则聚“风水”,德薄就失“风水”。“风水说”中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因而日本“风水说”更注重积德,强调择善而从,厚德处事。

日本的“风水”文化受佛教(神教)影响较深,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和较重的隐喻色彩,这种特点集中表现在神社的建筑风格上。日本的神道自然观认为,人与山、水、森林等自然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自然,由神生成的人与万物也会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8]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神社都与山岳、海湾、河川、湖沼、森林、瀑布等自然环境相联系。

这种神社建筑“风水”,追本溯源,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思想(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体),端倪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载有这样的神社传说:据说在天地开辟之初,出云之神凝望着大地说:“出云这块新的土地是个好地方,就是小了点,所以我要在它上面加点什么,让它变大些。”说完,他环顾四周,一眼望到了新罗,看见那里的土地恰好符合他的要求。于是他用绳子从那里拖来了四个岛屿,将它们加在出云的土地上……,(其中)第四个岛屿变成了一位大神的庙宇所在地,他的神社被赋予了可靠的魔力,能够保护稻田不受损害。^[9]

① 据风水典籍《青囊序》记载:盛唐时代,在被日本政府接二连三的派遣来的“遣唐使”群体中,曾有人关注到了中国的国粹——“风水”。于是,日本使者向唐朝统治层请求传授“风水”知识。不仅日本要学“风水”,当时的邻国高丽人(即今天的朝鲜半岛),亦非常急迫地向大唐请求传授“风水术”。国之利器,岂可轻易示人?“风水”,在历朝历代统治者眼中,是最为玄妙的“国之利器”。一向对中国称臣进贡的邻国高丽和东洋虔诚地提出求教“风水”之道,实在是给唐朝政府出了一道难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大唐决定向高丽和东洋“输出”由僧一行杜撰的伪“风水术”——只有“风水术”,而无“风水说”。我们知道,真正完完整整的“风水”知识,应该是“说”与“术”兼而有之。有“术”无“说”,意味着有树无根,有流无源,很难学术兼顾,标本兼治。

② “生态学”一词最初来自于日本,是日本东京大学一个教授取的,后翻译到中国,叫作生态学。

③ 日本历来神佛并称,佛就是神,神也是佛,佛即神,神即佛,所以在日本有“神佛”之称。

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起源于中国的“风水”思想,不仅对日本的“风水”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同在汉文化圈中的韩国“风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长时间的交汇和融合,中国的“风水”思想逐渐与韩国的儒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根植于朝鲜民族灵魂深处的民族价值观。韩国古代有一部话本小说《壬辰录》,其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战事结束后,明朝援军的主将李如松巡视各地,发现朝鲜风水极佳,暗暗寻思:这样的风水宝地必出大圣大杰,将来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大患,不如现在切断其地脉,以绝中国之后患。但当他找到气穴准备下手时,山神突然显灵,狠狠地惩罚了他。李如松只好打消念头,快快返回中国。^[10]

韩国人尽管尊崇基督教,但儒教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渗透进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淫在弥漫无际的功利氛围之中,《三国遗事·天龙寺》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都南山之南,有一峰屹立,俗云高位山。山之阳有寺,俚云高寺,或云天龙寺。《讨论三韩集》云:“鸡林土内有客水二条,逆水一条。其逆水、客水二源,不镇天灾,则致天龙覆灭之灾。”^[11]

韩国总统竞选前的迁坟风气,也极能说明其“风水”高度功利化的特点。每到韩国总统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些候选人为了获胜,往往通过翻新祖坟或迁移祖坟的方法来求得改运。“风水”之风在韩国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政治生活的福佑荫庇。当地一名政治分析家认为:“政客对自己改变命运的愿望很强烈。尽管‘风水’显然是封建迷信,却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因此,韩国政客们把“风水”视作能否获选甚至升迁的风向标,乐此不疲。

(二) 三国“风水术”之比较

“龙”、“穴”、“砂”、“水”是“风水术”的四大法宝。所谓“寻龙踏脉”,就是通过对“山水风光”的整体研究和景观分析,找出吉祥富贵可持续的优良生态环境。就“风水”实践范式的延伸维度而论,“风水术”有“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阳宅风水术”、“阴宅风水术”,以及“家具装饰风水术”(暂不讨论),后者包括选日择时、灾害预报等具体内容。

1. “空间风水术”

古人将“风水术”用在空间宅院(阳宅和阴宅)设计中,意味着选址、规划、设计、营造都要考虑到天文、地理、气象等因素,创造出兼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的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1) “阳宅风水术”

中国人的“阳宅风水”设计取法天地,却不拘泥于自然。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往往以宇宙天地之象作为仿效的摹本。中国“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更要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中国“风水术”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更倾向于主动改造山水环境,以实现其“荣宅吉人”的主观愿望。他们在选择宅地的时候,既然认为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阳光和气候特点决定朝向,那就在建房起屋、搭墙架椽时,面南背北,负阴抱阳。既然认为有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脉,有能拦邪气的曲折水流,便是好的环境,那就自己动手,积土成山,挖沟成河。

日本“风水术”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视“家相”(阳宅)^①“风水”。受佛教的影响,日本“家相”中所蕴涵的“空间风水”思想,既包涵了自然的物质因素,也暗

① 日本“家相”最重要的著作是《相家》一书,日本现代许多住宅形式和方位理论均直接参考了此书。

含着和合的精神因素。日本茶室(也称“草庵风茶室”)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草庵风茶室”是寺庙建筑和民间庭园相结合的一种小型茅舍,体现人们对静谧、和谐、回归自然理念的不懈追求。在“草庵风茶室”风水设计中,将树木种植在通往茶室的路上,营造出淡雅、简朴的环境,体现了茶道“和、静、清、寂”的思想情趣,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性灵。

日本人总是把运气的好坏与“家相”紧紧相连,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把运气的好坏与祖墓的“风水”联系在一起。紫式部在《王朝女性日记·檐下梅》中,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对“阳宅风水”的观感:(原先宅第)大如深山,春花秋叶,姹紫嫣红,胜于周边山色。(新居)狭小,不可同日而语,庭院局促,无树无木,甚觉无聊。^[12]

如果“家相”布局有些缺陷,就要想法弥补,日本民间会借用诸如设宝阁、添屏风的方法,实现他们“聚气”的风水意愿。如《源氏物语·夕雾》写到公主巧改丧室为喜屋一事时说:此时(储藏室)丧家装饰,似嫌不祥,故将做佛事的东室用屏风遮住。东室与正屋之间的帷屏为淡橙色,吉凶咸宜,并不惹眼。”^[13]

从“空间风水术”的内容来看,日本的“家相”和中国的阳宅风水略有差别。日本的“家相”特别重视方位,在日本当前流行的“家相”书中,方位“理气”^①占了绝对优势。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沿袭着使用罗盘计时、测向的传统风水习惯。不仅如此,日本的“家相”往往还和手相、面相等内容结合起来。日本德川时代曾流传着这样的手相定时法:朝暮之六时甚为难定,大的星星依稀可见,且观手背之血管,看不见细血管,只能略清晰可见三根粗血管之时,则六时定矣。^[14]

大约在公元 4 世纪左右,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受中国风水思想的影响,韩国人的“阳宅风水”尊崇自然,师法天地。在韩国“阳宅风水”中,自然环境始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佛教寺院是该国“风水”传统的明证,它们多半建在景色优美的山中,与山光水色交相辉映。对于自己仙居之山的风光水色(“风水”),韩国古代诗人徐敬德^②曾写诗赞曰:花潭一草庐,潇洒对仙居。山色开轩近,泉声到枕虚。洞幽风淡荡,境僻树扶疏。中有逍遥子,清晨好读书。^[15]

韩国“阳宅风水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决不作违背自然环境的徒劳尝试,也决不与周遭的自然景色竞争高低,他们往往赋予山水特殊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试图体现宅屋本身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风水”理想。因而韩国“阳宅风水”的主要特点,就是自然、简洁、明朗,能够给人宁静平和的感觉。《南宫先生传》中这样描写“仙师”所居的“风水”之地:忽有一洞,有川注于林薄,间流出大桃核,斗(注:人名)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师所住否?”促步溯流,可数里许,仰观一峰陡起,松杉翳日,有素屋三楹,倚崖而构,砌石为台,位置清垞。^[11]

(2)“阴宅风水术”

作为选择住宅地技艺的“风水术”,常被用作墓地的选择和转运的卜筮,逐渐衍化出“阴宅风水”术。在这一过程中,“阴宅风水”不断被涂抹上了巫术和迷信的色彩。由于不断增加带有迷

① 如果将“相土尝水法”和“山环水抱法”简单地归为中国风水学的形势派的话,那么“九八卦与三元运气法”就是中国风水学理气派的集中囊括。中国风水学理气派的基本宗旨,就是根据河图洛书、八卦九宫和阴阳五行的排布规律,把天(日、月、星宿)、地(地理、地质、宅、舍)和人(命、运、相)的时空构成联系起来,分析其间相生相克的关系,运用“时空合一”的风水罗盘,具体而细微地作出宅子方向、布局乃至兴建时序的选择与处理。

② 徐敬德(1489~1546),朝鲜王朝著名思想家,诗人。他的风水思想,主张“气”是万物之本,只有变化着才不会消灭。这首《山居》诗赞美了仙居之处的风水之盛,环境之美,被后人广为传诵。

信色彩的预言,“风水术”的意旨悄悄发生着蜕变。今天我们在进行中日韩三国“阴宅风水”比较研究的时候,应该秉承唯物、科学的原则,关注其合理的因素,剔除其迷信的成分。

中国人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生。中国人认为天下万物皆由“气”生成,死后若葬在吉地,即可内凭先人余气,外凭子孙思慕,兼受吉地吉气的催化,相互感应,共振共鸣。中国人认为祖先陵墓的吉凶好坏必能影响到子孙的福荫,这种葬先荫后的迷信心理主要表现在陵墓的选址上: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望气、尝水、辨认土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选出万年吉地,福荫子孙,泽被后世。

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长眠之地。陵墓前临平川,后拥青峰,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视野开阔,气势雄伟。修林翠竹郁郁葱葱,周围环境花娇叶秀。能给人以迎山带水、烟云缭绕、鸟语花香、气象雄伟的绝佳观感。站在如屏方山,面向似带秦淮,近看翼抱崇岗,远眺层峦后拥,正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日本民族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归。因而日本国民比较重视“阳宅风水”,相对忽视“阴宅风水”。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生机的流转,在他们看来,生死是可以轮回的。如果一定要选出日本“阴宅风水”的范例,神社是勉强可以算的。日本的神社建筑“风水”,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当时只是把山体、森林、老树围合起来,称之为神篱,加以祭祀。其神山、神木与围栅组合的原始形态,虽经不断发展,借景于园林、山水,但往往以真山真水为衬托,仍然体现着日本“阴宅风水”亲近山水、回归自然的特点。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对安住神社所在的高根山风光水色(“风水”)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描写: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峰顶,藉草而坐。前面,大壑赫然张开巨口。隔着这条沟壑,左首耸立着臻名富士,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山。两山之间,夹峙着臻名湖,水窄如一幅白练。湖的对面,扫部岳和鬘栲岳等高山临水而立,将湖面映衬得更加低平。乌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雪光灿灿,如波涛绵亘于天际。^[16]

日本不大重视墓地建筑,即使是历届天皇的墓地,也多为土坟,而且规模不是很大。日本国民注重的是墓地周围的环境,崇尚死后拥抱山水,回归自然。与之不同的是韩国和中国,既重视“阳宅风水”,也注重“阴宅风水”。但韩国人持有“生死如幻,富贵在地”的生命观念,与中国“生死在命,富贵在天”的“风水”思想有所不同。庆尚南道马山地区流传着一首儿歌——《宝贝闺女》,其中唱道:爹是京城两班,娘是晋州新娘。我是一枝独苗,爹娘的心肝。或许哪一日,我命归西天,请别埋我在前山,也别葬我在后山。只愿深深地把我埋进南山莲花台。^[17]

韩国人往往把命运归之于土地,认为有关生死的任何事件都与土地密切相关,无论是生者的居处之所,还是人死后的安身之处。因而韩国人在判定家运和前途时,更看重“阴宅风水”。他们觉得如果坟墓的选址合乎风、水、罗盘方位以及地势上的“风水”特征,就一定能招来好运和繁荣。韩国浓厚的家族观念更使这种观念不断强化,逐渐成为韩国国民的一种信仰,浸润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2.“时间风水术”

“时间风水术”,在今天看来,颇有“八卦”^①的意味。当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水平

①《易·系辞》云:“古人包羲氏为称王天下,仰首观看天象,俯身视察地理,观鸟兽交合之百态,察大地时令季节之变化。于是近取自身为中心,远取天地万物为模式,创作八卦。”这是八卦的最早出处。现在多带揶揄意味,对不着边际的事情的无限寻根究底。

的提高,中日韩三国,无论哪一个国度的“时间风水术”,都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因而在看待三国“时间风水术”的时候,也应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择其善者而关注之,择其不善者而改进之。

与日本和韩国“时间风水术”强调察地不同,中国“时间风水术”重视观天。中国的农历“风水”既主张“看天”,也主张“看地”,他们认为天地之气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而是互化互动和彼此影响的,诚如《论衡》所云:“云雾,雨之徵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这种云、气、雾、露相互转化的思想,暗合了系统循环论的科学思想,包含着“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对观察预测气象气候以及防灾抗灾,极有用处。

日本人在出门时,都要占卜起程的日期和方位的吉凶。日本“风水”对数字特别讲究,比较喜欢用奇数,一般选择在单日出行,这与中国人讲究双日出行不同。在日本,人们建造房屋时,需要请“家相”师代为选择开工日期。此外,日本还有种种神秘的仪式,比如盖房动工前,要举行所谓的“地镇祭”,以安慰东方地神,祈求施工安全;在上梁时,还要举行所谓的“上栋式”,保证上梁不出意外事故。这些仪式专门由神社里的“神官”来主持,煞有其事。

韩国对占卜也非常重视。早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代,国家就设有专门的占卜官(称为“日者”或“日官”)。其占卜的内容五花八门:有天象、灾异、星象、动物、植物、梦、相貌、游戏、比赛、生辰八字……几乎无所不包。在长期的“风水”占卜中,形成了各种禁忌和说教,主要体现在一些建筑仪式当中。比如在建造房屋之初,先要向“风水师”询问,看自己的生辰八字是否适合建房屋的运数,如果不具有建造房屋的运气,就换以别人名义建房,然后作形式上的房契,进行买卖交易。这些程序及要求,其实极符合现代法制社会的契约精神。

四、“风水”文化差异的原因探究

为什么中日韩“风水”系出同源,但三国的“风水”文化迥然有别呢?我把这种“风水”文化上的差异,主要归结为环境^①的不同。试想:韩国和日本,一个生活在半岛上,好像始终站在悬崖边上;一个生活在岛屿上,总像颠簸于汪洋的海上,积渐所致,养成两国国民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心理。相比起来,日本多地震,多暴风,少资源,不安全感尤甚。时空感受的局促与生存环境的压抑,养成韩国国民和日本国民听天信命的思想意识,加重了他们对“风水”的信仰程度。

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缺乏整体感,鲜少安全感,而频繁发作的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使原本就极端忧虑的民众心理,变本加厉为万分恐惧的社会心理。不难想见,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最容易产生生命“无常”之感。岛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因素,时常让日本国民萌生孤独无助之感,长久压抑之下,喟叹无常之余,他们往往会祭起“风水”这面大旗,以天地作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此外,日本的“风水”文化深受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神教)的影响。周作人有一番话,用以揭示日本文化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它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18]

^① 分为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态环境等)和人文环境(社会心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我想这段评述同样适用于日本的“风水”文化。日本的“风水”文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这与日本民族长期形成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因为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从思维方式上分析,就是对事物特殊性的高度敏感与执着,感性大于理性,局部大于整体,这种倾向,自然也会反映到日本“风水”文化之中。^①

韩国地处亚洲大陆东端,是将大陆文化传递到日本的桥梁,在中日韩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介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中间的文化性质。公元4~5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化的思想根基。尽管韩国拥有东亚人口比例最高的天主教徒,但也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宗教信仰”,因为韩国的儒教无处不在。但韩国人从不拘泥于儒教传统,他们对儒教思想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表现在“风水”思想中,既不十分激进,也不完全保守,往往取其中庸之道。

“风水”文化所要传达的,是它背后厚重的生命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生命意识。“风水”文化所要强调的,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诉求,是人们期望避凶趋吉的生命希冀。如果说,在山水林木的护卫下生活起居,是人们获得安全和温暖的最佳环境选择,那么我说,宗族血缘关系化解了人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是弥漫于人际场中的另一类“风水”。大家知道,韩国人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几乎是族族有族谱,家家讲“风水”。即便是企业,也是以家族经营为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家族。这种由层层血缘关系凝聚成的血缘社会,自然更加讲究“风水”。在韩国,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无论是七姑还是八姨,都会被纳入“风水”福泽的对象之中。因而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中,人们极其愿意选择一处“风水宝地”,惠及自身、家人乃至家族中的人们。

五、结语

中日韩三国“风水”均根植于中国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源而异流,最终将被纳入生态学的范畴之内,汇入东北亚传统文化主流之中。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蕴含着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但三国“风水”文化的个性也极其鲜明:日本的“风水”文化中融入了佛教和神教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与密教的神秘气息和巫术仪式;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润在浓厚的功利氛围之中。日本的“风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韩国的“风水”脚踏大地,现实功利。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

“风水”是祖先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全球第一位“风水”学博士尹弘基先生曾撰文指出:“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19]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风水”一旦剥去被历史风尘裹上的层层神秘外衣,所折射出的科学光芒,会熠熠闪光,烛照千古。

在文章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不妨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话作为结尾:所谓“堪輿”者,实为吾国上古质朴之科学研究,托迹于生死孝道之际,穷究其地质之妙,与道家五岳真形图

^① 日本几次大的建都活动都是由“地相”师鉴定而兴建的,如:难波京的建造(744年),天武天皇的畿内都城的建造(681年),元明天皇的平城京(奈良的前身)的建造(710年),均是如此。其中的奈良之所以被相中作都城,是因为它“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圆,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宣建都邑。”

之旨,皆为别具肺肠,揭示地球物理之心得也。其学是否足为定论,遽难下一断语。然两千余年,囿之于埋葬之说,加之于妖妄之言,诚为大过矣。若今之学者,能先尽自然科学之基础,融通人天哲学之理念,掘发古学之长,阐扬今学之妙,则堪輿之为说,亦大有可观矣。^[20]

参考文献

- [1] [日]郭中端.中国人街[M].日本:相横书房,昭和 1955.
- [2] 何晓听.风水探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 [3] [美]华尔街日报,2008-10-14.
- [4]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5] 王玉德.古代风水术注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6] 韦宝畏,徐文芳.风水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对韩国居住环境选择之影响[J].华中建筑,2011,(1).
- [7] 于希贤.中国风水对世界文化的影响[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 [8] 王守华,王蓉.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M].石家庄:河北出版社传媒集团公司、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274.
- [9] [英]张伯伦译.古事记[J].日本亚洲学会月刊,1982,第 6 卷(增刊).
- [10] 佚名.从朝鲜风水谈起[EB/OL].东方文化弘未来咨询网,http://www.zhouyi.com.cn2005-01-03.
- [11] [韩]一然.三国遗事[M].[韩]权锡焕,[中]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335,52.
- [12] [日]藤原道钢母,紫式部.王朝女性日记[M].林岚,郑民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97.
- [13] [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6:554.
- [14] [日]山本七平.何为日本人[M].崔世广,王炜,唐永亮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361.
- [15] [韩]权锡焕,[中]陈蒲清.韩国古典文学精华[M].长沙:岳麓书社,2006:192.
- [16] 叶渭渠.日本随笔经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80.
- [17] 沈仪琳.朝鲜人性格试析[A].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韩国学论文集(第 1 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62.
- [18] 周作人.药味集[M].北京:新民印书馆,1942.
- [19] [新西兰]尹弘基.韩国堪輿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1).
- [20] 南怀瑾.中华文化泛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第 72 章.景(影)印“地理天机会元序”.

(责任编辑 李英武)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People in East Asia and Revelation: Case Study of Republic of Korea and Singapore LIU Shu XUE Zhong-yi · 71 ·

Abstra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peopl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health of national party politics.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people in East Asia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unning an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in East Asia. Although the mod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Republic of Korea (ROK) and Singapore are different, they have covered the main mod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East Asia.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certain rules and experiences to follow: fully playing the dynamic role of parties, taking a flexible way to communicate,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ctively, and so on. Learning the experiences from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s ruling party and the people.

Key Words: parties in East Asia; peop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velation

Reviews on the Security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GAO Ke · 79 ·

Abstract: Strategy is the planning and guidance on global, high-level major issues of a state or government. However, policy is the guidelines for action to realize the route of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by the state or party. After coming into power,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faced with new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s a new party with no experiences in governance, the Democratic Party should only follow the policies of the LDP government in strategic level. As a result, there will be no sudden change. Since 2011, due to the tough situation of Korean Peninsula, frictions of Sino-Japan relations, and Russia-Japan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re are new uncertainties in Northeast Asia. The security polic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 is facing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ase, new policy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re unavoidable. Noda, the Prime Minister, his character and sleek way of doing things will increase the uncertainty for Japan to get out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dilemma in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 Japan; the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alliance; relationship; problem and challenge

On the Use of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ZHANG Xiao-tong WANG Hong-yu ZHAO Ke · 91 ·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is caught up in a new dilemma: having unprecedentedly rich power resources while fac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situation.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lies in 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in transforming economic power resources into concrete results. The erosion of power resources in domestic process and the difficulty of transporting power resources across se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in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resources into results. Only by clearly delineating national interests, comprehensively employing both grand strategy and tactics, more closely coordinating internally and strengthening external strategic dialogues mechanisms can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be properly wielded.

Key Words: power; power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strength; economic diplomacy; power resources; domestic process; strategy; linkage strategy; grand bargain

Thinking on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Jili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Reforms" LIU Guo-bin ZHANG Dong-shuang · 99 ·

Abstract: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aking the "Three Reform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For Jilin Province, advantages of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rapid growing county economy,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key status of agriculture, inpu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tc. On the other hand, disadvantages are as follows: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bsence of the institution of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lack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weak agricultural R&D ability, and etc.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Jilin Province should strengthen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taking the "Three Reforms" as a whole.

Key Words: "Three Reforms"; overal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Jilin Province

Geomantic Culture of China,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A Comparative Study LI Qi-ke CAO Xing-sui · 108 ·

Abstract: Geomancy is 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Geomantic culture of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ROK), which is deeply affected by Chinese Geomantic culture, is quite different. Rooted in traditional Yi culture, the Geomancy of the three countries has distinct features of Physiocracy and plain thoughts of cultivation. Besides, thoughts of architectural ecology and architectural esthetics are concluded, and ec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humanity implication is varied. Geomancy in the three countries is utilitarian, ecological and systemic in common. Howev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mantic Hypothesis and Geomantic Omen, different features among the three can be easily found due to geographic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Comparative study of Geomantic culture of the three countries is beneficial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 of Han culture in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 Geomantic culture; Geomantic Hypothesis; Geomantic Omen, Sino-Japan-ROK; comparative study